

# “古董·今董”全形拓与金石学策展思考

文 / 张祖伟

**摘要：**全形拓是清中期出现并盛极一时的一种呈现古器立体形态的传拓技法，因民国以来图像技术的冲击而早已难以为继。近几年，全形拓成为展览热门主题，但展览都仅从技法角度解读，忽视了其金石文献本质及独特文化内涵。基于山东在金石学、全形拓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对全形拓金石文献本质的溯源，山东博物馆近期举办的全形拓展创新性地采用技法与金石文献价值兼具且侧重后者的双角度解读，取得了良好反响。

**关键词：**全形拓；技法；金石文献

全形拓，又称全角拓、立体拓等，是一种将金石古器立体形态高保真地移置到纸张上的特殊传拓形式，具有在平面上展现三维效果的功效，是古人为古器存照的智慧结晶，扮演着照片的角色，又兼水墨韵味而极具观赏性。其大致由马起凤始创，“吴门推拓金石，向不解作全形，迨道光初年，浙禾马傅岩能之。六舟得其传授……阳湖李锦鸿亦善是技，乃得之六舟者”<sup>[1]</sup>。后因潍县陈介祺大力推行相对简便的分纸拓而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民国又因周希丁、马子云等吸收西方素描透视、光影等因素而攀至顶峰，但已是最后绝唱。因同时期传入的摄影、印刷等技术的冲击，其实用功能大为减弱，逐渐难以为继。当今时代图像技术更加发达，更鲜为人知。

为了更好地宣传及传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近几年全形拓成为展览的热门领域，多个主题展览被推出，如浙江博物馆“金相椎痕——金石学发展与青铜器传拓（全形拓）精品展”、上海博物馆“与时偕行：金石传拓技艺”。浙博按照时代分新旧两组，以示技艺传承。上博基于雄厚馆藏，全形拓与原器对应展出，皆取得良好反响。但仔细观察，它们存在着侧重从技法表现力及传承角度解读的共性。然而，全形拓价值远不限于技法展示，其本质是一种金石文献。清嘉道时期，因严酷文化政策的压迫，众多学者怀着补益经史的心态，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到金石研究，推动金石学进入鼎盛时期。而之前仅拓制铭文的平面拓，耗时耗工且仅适合结集的雕版印刷术，都无法满足学者广泛且频繁的学术交流中对器物综合信息的强烈渴望。于是，在金石学家与优秀拓工的积极探索下，全形拓应

运而生，并蔚然成风。流传中又产生铃印、题跋等新信息，逐渐成为独立的金石文献，具有独特金石学价值及文化内涵。

### 一、全形拓金石文献价值举例

仅以山东博物馆馆藏为限，全形拓至少具有以下四点金石文献价值。虽皆为细枝末节，但对相关问题却不可轻视。

#### （一）为失载失传器物存图

因金石学家素重三代而轻秦汉，导致大量秦汉器失载，造成其知闻范围十分有限。一旦失传，后人难知。若幸有全形拓，则可据此考知，馆藏数件此类拓本。

汉永始元年弩机全形拓，出自咸丰同治年间著名拓手程谦吉之手。所铃“王懿荣”“莲生所藏金石”表明其器主，又有光绪二十年（1894）吴道芬跋，“古弩机最多，然全美者不甚见。按此器为福山廉生太史视学陕西时所得，字迹略有剥蚀，尚不为害，宜其宝之。光绪甲午新春吴道芬识”。王懿荣藏器目未见编纂，它书亦未著录。此拓不仅保存器物图形，且补充其他信息。



图一 杜尚跋秦二世诏权全形拓

又，杜尚跋秦二世诏权彩拓本（图一），虽钤有“簠斋藏三代器”“齐东陶父”等印，但据《簠斋藏古目》等多种藏目，陈介祺仅藏有 1 枚始皇诏版秦权而无拓本原器，且未见他人著录，藏家成谜，拓本当是他人所赠。据统计，宋至民国的金石著述仅收录秦诏权 108 枚，其中二世诏秦权仅 5 枚，且均未传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出土的 19 枚秦诏权中亦无此类。<sup>[2]</sup>由此可见二世诏秦权稀见程度，而拓本提供了 1 枚清代存世样本，价值不言而喻。

另有一件秦始皇诏陶量翻刻拓本与此二世诏权拓本相类，虽亦钤簠斋“古陶主人”“海滨病史”等印，但文献仅载其藏有 20 余件残片，且亦从未见他人收藏完整陶量记录，来源更成谜，拓本无疑也是他人所赠。据《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现存 5 件始皇诏陶量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出土<sup>[3]</sup>，且与拓本原器不

同，外壁均无竹节纹。则馆藏拓本提供了一件早在清代就已经完整出土且具有独特纹饰的始皇诏陶量，极具文献价值。

## （二）人物传记补遗

此类补遗罕见，而馆藏两件拓本恰好可补吴公谨易名吴慈之漏。洹子孟姜壶，旧称齐侯壘等，共两件，阮元得其一。馆藏其监拓是器全形拓，有咸丰二年（1852）吴慈跋，“……怡情老人得此壘于篆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后，……丙午初冬，因贺重宴鹿鸣，来甥馆贻予一器一铭拓本，藏之诚厚幸矣，壬子春二月花朝吴慈谨识”。寰盘，阮氏“家庙四器”之一，馆藏其监拓六舟手拓是器全形拓，亦有吴氏同年跋，“嘉庆九年，先外舅阮文达抚浙时得此器。……余于丁未之春计偕北上，道出广陵，遇诗僧六舟于梅花岭下，属为余拓全形，藏之行篋。……壬子三月望后五日，慈记”。

跋语中的“先外舅、甥馆”表明阮元与吴氏系翁婿关系，但据《阮元年谱》<sup>[4]</sup>，阮元共有 3 个女儿。5 岁夭折的长女阮荃、江都张熙妻的次女阮安及适钱塘吴公谨的三女阮正。吴公谨，字修梅等，协办大学士吴璥之子，江浙地区颇有影响力的鉴赏家。据《清史列传》《平湖县志》《吴菘圃府君自定义年谱》等，其并无吴慈的用名。目前与吴慈相关的文献仅 1 处，其作为知州撰写的《平度州志·序》称，“余幼岁先官保东河帅任居山左日最久，屡奉移节南河、两江，内擢中台，洊升揆席，随侍往来……余初筮仕粤西郁林，时于勾漏，洞窥秘书，权守南宁于昆仑关……钱塘吴慈撰”<sup>[5]</sup>。尾镌“吴慈”“臣慈”两印与馆藏两拓所钤相同，可见二者为同一人。巧合的是，同籍、同样荫生出身的吴公谨也作过山东平度知州，且吴慈序中所述父子的履历与吴公谨父子的履历完全重合，故吴慈就是吴公谨。可见，吴公谨其后半生曾以吴慈行世，或使用期较短而导致后世不知。这一传记拾遗无疑有利于吴公谨个人及家族研究，且吴慈名下用印的发现也有助于完善相关藏品的流传经历。

## （三）补益器物考释

“灵山卫三量”子禾子釜、陈纯釜、左关之铏，咸丰七年（1857）山东胶西灵山卫古城出土，是研究齐国量器制造及管理制度的重要实物，辗转归陈介祺。馆藏一轴簠斋监制并跋的陈纯釜全形拓（图二），其最贵重之处是两篇从未出版的 1100 余字长跋，结合其他文献的命名可知，其是簠斋对三器最早最详考释，“……文有子和子字、陈字，是田常曾孙太公和所作器也。又有品字，当是‘豆

区釜钟’之区，器之名也。陈完敬仲之如齐，在桓公十四年，以陈字为田氏。……又一七行，行五字，共三十四字。第一行文曰‘陈猷立事岁’与齐侯甗文曰‘国差立事岁’者类。彼当是国惠子夏相景公时所作器，此乃陈太公和相宣公时所作器。……同治丙寅三月廿八日夜作考”。



图二 陈介祺监制并跋陈纯釜全形拓

目前簠斋著述中有 7 种涉及对陈纯釜的命名，但并不完全相同。《簠斋藏器目》（第二本）、《簠斋吉金录》《潍县陈氏宝簠斋藏器目》与馆藏拓本同称区，《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金文题识》称区的同时，又额外标明吴大澂称釜，《簠斋藏器目》《簠斋藏古目》则称作釜。其中两种著述有明确时间，据各自序，

《宝簠斋藏器目》系同治十年（1872）吴重熹襄助而成。<sup>[6]</sup>《簠斋藏古目》底本定稿于同治十三年（1874）。<sup>[7]</sup>再结合馆藏拓本的同治五年（1866）题跋可知，簠斋对此器有一个受吴大澂影响而先“区”后“釜”的认识转变。因前述7种簠斋著述皆系仅有命名的著录，故馆藏拓本题跋是簠斋第一篇非常详细的考释。不仅可以找到一些观点的源头，如制器者为齐太史公田和，二量是田氏收放贷用器等，更有一些仅见于此的观点，如三器制于田和伐安陵归途中，猷或为太公之名，陈逆敦、陈逆簠皆田氏制器等。同时，其释“𠄎”为次，“𠄎”或为“识”，“𠄎”为地名等，也与《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不同。这丰富了簠斋考释三量的资料，极具文献价值。

#### （四）丰富金石学家藏器信息及器物流传经历

馆藏一套刘喜海监拓父辛卣、师盂父鼎、且戊觚、西弗生鬲四器全形拓，除师盂父鼎见于《长安获古编》外，其他三器未见刘氏收藏记录。而4件拓本均钤“燕庭收藏钟鼎文字”，且无论构图还是制拓风格完全相同，明显同一拓工同一时之作。可推知，只有四器均为刘氏旧藏，方能同工同时拓制。故此组拓本至少可为刘喜海补充3件藏品，也丰富了此三器的流传经历。

#### 二、全形拓展览策划思路

得益于“金石甲天下”，宋代以降，山东金石学家辈出，可谓金石学研究重镇，在文化史上写下浓重一笔。为了贯彻以学术为支撑、以展览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及展示山东百年金石学发展成就，基于对山东在金石学、全形拓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全形拓本质是金石文献、金石学家交流媒介的理解，我们策展团队策划了名为“古董·今董——山左金石全形拓文化艺术展”的全形拓展览。其中，古董指原器，今董指全形拓，指古人视角下的金石资料。

馆藏全形拓近200件，其原器多样，且多名家监拓，也不乏名家题跋，名工施拓。紧扣山东区域因素及对全形拓本质的溯源，我们从中遴选了36组69件全形拓及34组53件其他文物，并精心设置了一个全新的双重叙事结构：

第一单元“古器图示之溯源”，讲述全形拓出现之前，宋代以来金石学家表述器物图文方式概况，介绍平面拓、著述、临摹图三大基本方式，各类又有细分。如根据金石陶及图文的不同，平面拓展示了姚华跋秦琅琊刻石清嘉道拓本、熊梦宾跋汉熹平石经《春秋》残石民国拓本（配原石一种）、吴大澂监拓并跋秦汉瓦当拓本四条屏、陈介祺监拓并跋君车画像石拓本、吴重熹跋莒小子簠铭文拓本。

著述方面制作了“宋人可考金石著述图文表述方式一览表”，并展出了代表镌刻铭文的清顺治济南谢世箕刻《集古录》《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清抄本，代表摹刻图形的清乾隆十八年（1753）刻《亦政堂重修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录》。摹绘器形图，虽今已稀见，但宋人确已采用。“李伯时自画其所蓄古器为一图，极其精妙，……真一时之奇物也。”<sup>[8]</sup>此版块展示了路线相异的2组5件绘本。其中徐念馥绘器物四条屏采用泥金白描，器物取自《宣和博古图》周叔液鼎、汉双鹿壶、商宝卣、周虬钮钟、周雷纹、周刘公铺、周云雷罍、商子孙彝。又有铭文原器拓，器形彩绘的蒲真应铸钟绘本，原器系武周长安四年（704）合州庆林观观主蒲真应为女皇武则天而铸，现藏阆中博物馆。

第二单元“金石契友之新宠”，借助全形拓讲述山左金石学家金石故事，为重点打造单元。为了直观介绍第一版块“山东金石学家群概述”，制作了能让观众共情的“清至民国山左金石学家籍贯分布图”，按地级市罗列鲁籍及来鲁宦游的数十位金石学家，并辅以11种珍贵金石著述，几乎皆是从未出版的稿本与拓本集。如黄易外孙李璿临《黄易得碑图》、孔广枬撰《藤梧馆金石题咏集录》稿本、陈介祺批校《汉封泥考略》稿本、李璋煜辑陈介祺跋、桂林周安康辑金石拓本集等。最稀见的当属清抄本《山东全省金石造像墓碑调查表》，此是清代山东地方政府对全省金石资源的调查文献，突显了山东丰厚的金石家底。又《宝簠斋集各家彝器释文》清抄本，为陈介祺整理并考释刘喜海、李璋煜、许瀚、阮元等金石契友所赠藏器拓本而成，海内孤本。第二版块“山东金石学家的全形拓”展示了金石学家借助全形拓以交流的状态，共设置了涉及15位金石学家的20组38件全形拓，又附2件拓本原器。如反映以阮元为首的金石学家群活跃交流状态的拓本群——阮元监拓六舟手拓格伯簠与寰盘、阮氏监拓张廷济吴慈跋虢叔大林钟、阮氏监拓赵世骏跋汉双鱼洗、阮氏监拓吴慈跋孟姜壶拓本，刘喜海监拓父辛卣等四器拓本，陈介祺监拓毛公鼎、噩侯鼎、秦始皇诏令铁权及金石契友赠送的季良父壶盖、秦二世诏铁权、秦始皇诏陶量拓本，吴廷康监拓丁彦臣跋右丞宫鼎拓本、王懿荣监拓永始元年弩机拓本、张允勳监拓<sup>𠄎</sup>鼎拓本、丁树楨监拓射妇桑鑑拓本（配原器）、张广建监拓秦公簠拓本、陈氏后裔监拓王献唐跋灵山卫三量拓本及目前仅见的簠斋藏有铭钟全家福——十钟山房藏钟拓本十二条屏。最大亮点当数吴式芬监拓陈介祺跋汉承安宫鼎、卫少主营邑家鼎拓本对屏。据同治十三年（1874）簠斋跋，拓本为吴氏邀名工李锦鸿制拓并赠予李佐贤，李佐贤又嘱

吴氏秦晋之好簠斋题跋。极好展示了山左 3 位金石名家的交流状态，诠释了全形拓在金石学中扮演的媒介角色。又陈氏考释两器仅见于此，《双虞壶斋藏器目》未载卫少主菅邑家鼎，拓本则见证了吴氏收藏是器。此外，我们还配展清李育绘《李佐贤考古图》及馆藏卫少主菅邑家鼎原器，以展示全形拓肖形功能，极大丰富了观赏层次。

第三单元“器物流失之拓存”，用原器流失海外及下落不明甚至亡佚的极端情况，突出强调全形拓在保存器物图形信息方面的重要价值，是本展览独创的解读角度。为此制作了包括 41 件原器的“馆藏全形拓商周原器流失海外或下落不明表”，又陈列其中 15 组 24 件拓本。流失海外的原器有且己父己卣（现藏瑞士苏黎世瑞列堡博物馆）、牛鼎（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雍伯鼎（美国费城宾省大学博物馆）、正御爵（美国华盛顿萨克勒美术馆）、师望鼎（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吴潜手拓并跋拓本）、齐侯四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原君锡手拓王懿荣王献唐跋拓本）、者姁方爵（美国底特律私人藏家，张廷济监拓并跋拓本）。原器下落不明的拓本如刘喜海监拓良季鼎等四器、张允勳跋蔡姑簠、吴重熹跋虞嗣寇壶、丁树桢监拓父癸方鼎、丁麟年监拓伯田父簠四器等拓本。其中价值最高的当数原君锡手拓父甲卣全形拓，其原器至民国始有《三代吉金文存》《续殷文存》两家著录，但无流传及图形信息。而馆藏拓本不仅可弥补图形之阙，且其光绪十二年（1886）陈氏跋也揭开了此器罕见之谜。“……器为内府所藏，光绪六年六月御赐肃邸四十正寿者。君锡先生得拓一纸……丙戌嘉平十有七日寅生陈麟炳呵冻书。”即最初一直深藏内府，且《内府藏器著录表》《西清古鉴》等藏目未录，后又入王侯，常人难以寓目。

第四单元“全形拓艺之流变”，讲述全形拓技法种类及对书画的影响。第一版块介绍了全形拓中的类似雕版印刷术的翻刻拓，并展出著名范本陈介祺监拓汉器八条屏，馆藏本另有丁佛言以甲骨、金文、篆体等 8 种书体临簠斋跋语并介绍先后两次方才完璧此组拓本的曲折经历。第二版块“引拓入画”介绍了拓绘结合的博古图及刻意仿效全形拓拓制效果的绘画——颖拓。前类拓制器形而补绘花卉等，如黄宾虹补绘的陶壘全形拓（图三），以往肃穆摹古平添了几分活泼雅趣。而后类在全形拓展览中少见，所展代表颖拓最高水准的姚华所制四器图，不仅难得一见地在墨绘器身上高逼真地彩绘铜锈，且其跋直言系临摹全形拓而作，又其



中所称张士保旧藏的周罍壶、陈介祺旧藏的匹君壶与传世同名器铭文略不同，似以往未知的失传器，文献综合价值较高。



图三 黄宾虹补绘齐阳瓦罍全形拓

以上四个单元中，第一、四单元为技法角度，第二、三单元为金石文献价值角度，密切关联的双叙述角度中又注重后者，此解读结构以前全形拓展未见。在精选文物的强力加持下，此创新结构成了本次展览最大亮点，得到了观众普遍好评。为了进一步深化包含此展在内的金石学主题展览，在馆领导的策划下，本馆还举办了“晚期铜器与金石学学术研讨会”。来自文博机构、高校的 40 余名参会学者、文博同人及一线策展人也给予积极反馈。

为了加强观众参与感，我们还在趣味性、互动性上作了专门设计。如针对观众对全形拓制作的好奇，录制了全制作过程视频，并设置了简易拓印体验。在展览末尾设置了“技法对比及寻找下落不明器物”等呼应问题，以激发观众传承兴趣及重视文物保护意识。

最近数年，文博旅游兴起，观众文博素养普遍提高，对展览水平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同主题展览策展面临的困难尤其突出。这需要策展人更加积极应对，探索创新。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深度了解文物，参透其文化内涵，并寻找新叙述角度，方能讲好故事，让文物活起来。“古董·今董”全形拓展，就是我们面对同主题展览困境下的一次溯源与创新的积极探索，得益于馆领导的支持与策展团队的群策群力，有幸找到了新诠释角度，交出一份比较令人满意的答卷。

[1]徐康：《前尘梦影录》，《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卷下第47页。

[2]巫鸿：《秦权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4期，第33页。

[3]国家计量总局等：《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68页。

[4]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年，第784页。

[5]吴慈：《平度州志》，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

[6]陈介祺：《潍县陈氏宝簠斋藏器目》，《山东文献集成》第四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4页。

[7]陈介祺：《簠斋藏古目》，《金文集成》，线装书局，2005年，第138页。

[8]（宋）王明清：《挥尘余话》，《津逮秘书》，明毛氏汲古阁刻本，卷二第34页。

（责任编辑：阮富春）

（责任校对：周洋）